

# 儒家的人文精神与文明对话——杜维明千年学府报告会

2007-06-09 18:40:00

主持人：大家好！这里是岳麓书院杜维明千年学府报告会的直播现场。

千年弹指一挥间，书魂学魄一脉成，岳麓山下的书香已经在历史的脉搏中飘逸了一千多年，沧海桑田，带走了一代代学人的身影，却带不走硕学鸿儒们传道、授业、解惑、救世济人的精神，这一切依然还在岳麓山下熠熠发光。历史在这里留下了凝重而又清晰的脚印，湘江的涛声依然奔腾不息，躬逢盛世，古老的学院重新焕发出勃勃的生机，今天是我们湖南卫视和岳麓书院共同举办这次千年论坛，我们衷心地希望，我们的努力能为千年学府的英名再添一丝亮色，千年学府的书香能够飘得更远、更久。好，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朱汉民先生为我们请出杜维明教授，欢迎！（掌声）

二十一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摆在我们面前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纪呢？记得在本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亨廷顿教授在他的名著《文明的冲突》中间曾经指出二十一世纪将是文明冲突的世纪，然而几乎就在同时他在哈佛大学的同事——著名华裔学者杜维明教授却提出了另外一个几乎是完全相反的观点：二十一世纪将是文明对话的世纪。是冲突还是对话，历史自有评判。

杜维明先生祖籍广东南海，1981 年起开始担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现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哈佛燕京儒学研究所讲座教授，是当代新儒家的顶尖级代表人物之一，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威望。

今天非常令人高兴的是，在岳麓书院和湖南卫视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了杜维明教授来岳麓书院设坛讲学，他讲学的题目是《儒家文明精神与文明对话》，杜教授，请！（掌声）

[杜维明 哈佛大学教授 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 杜维明：

朱院长、湖南卫视和岳麓书院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们，大家好！

我感到万分荣幸，能够有这个难得的机会在千年学府，而且对儒家人文精神作出极大贡献的岳麓书院提出文明对话的构想。就在今年十月七号到十号我在北京参加了纪念孔子诞辰 250 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由国际儒联所主持的，这个由 17 个国家的学术代表 260 位学者参加的学术盛会，共同提出了 160 多篇论文。这些论文对儒家从屈服，所谓朱氏源流发展到中原的文明，当然包括京楚一带，然后从中国发展到东亚，又从亚洲面向全球，这个儒家发展的所谓三期，都作了超时代、跨文化和多学科的探索和研究。10 月 13 号，我在贵阳参加了以王阳明的文场顿悟为主题的文化节，在休县，也就是阳明顿悟的农场，和贵州许多的学者乃至成千上万的同胞一起，来探索王阳明新学的一些基本价值，比如说，知行合一，致良知和世上磨炼，在 1996 年到贵州的时候，还不是很多人知道王阳明，但这一次呢王阳明是大家都耳熟能详，对儒学的情况有进一步理解。前两天，我们在武汉和国内外著名的学者，象王中一、任继愈、庞朴、李学勤和裘锡圭，大家一起参加了国电储木竹简的讨论会，对儒家的原始古典的形态，特别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所体现的人文精神进行了一些诠释，进行了了解，因为这个出土的文物使我们对孔子第一代的学者，第一代的学生所提出的问题有了一些文献上的证据。熟悉书集著的编撰者曾经很明确地指出来，我们应该顺着《大学》、《论语》、《孟子》和《中庸》的顺序来了解儒家的核心价值《大学》所呈现的可以说是步步扩展层层深入的一种修身哲学。如果用一个形象的语言呢，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大学》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是一个逐渐向外拓展的同心圆。这个同心圆的外圆应该是开放的，从个人到家庭、到社

群、到国家、到世界乃至到人类的群体——宇宙。它是向外扩展的，同时它是层层深入，对一个人的身体，我们的心知、我们的灵觉、我们的神明。就象陆象山说的，它这个人文精神是一个十字打开的人文精神，一方面向外扩展，一方面向内深入。后来孟子所谓的“掘井汲泉”，尽量在我们存在的条件之中向内发掘，一直要碰到一个能够向外通的源头活水。这一个思想的体系，不仅在中国，而且后来在东亚，现在在世界上也受到大家的重视。

《论语》提出了“为己之学”，“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在1985年我在北京大学担任了中国哲学系关于儒家哲学的课程。我第一就先问我们的同学，说“儒家的思想是为己还是为人？”。当时绝大多数的在北大的同学，包括研究生，都说“那当然是为人，为人民服务，儒家的应该是为人之学”。我说这个和《论语》里面所讲的正好相反。《论语》里面提得非常清楚，“儒家是为己之学”，不是为了师长，不是为了家庭，甚至也不是为了简单的社会的要求，是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人格，为了发展我们自己人格的内在的资源，是“为己之学”，不是“为人之学”。

但是这个己不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它是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从这中心点来讲人的尊严，从关系网络来讲人的社会性、人的感通性、沟通性。所以儒家里面在《论语》里提出的一个基本价值，“仁爱”的“仁”的基本价值，它有两个向度：一个为人有己，每一个人都可以阐发他自己内在的道德资源，每一个人都可以发展他的独立人格；同时人一定要敢痛，一定要通过同情，一定要能和社会逐渐地展现。儒家从这个角度来看，《论语》所体现的不是一般我们所谓的道德说教。

一位日本的学者叫今道友信，我跟他在韩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时候，他说：“假如我们把《论语》当作对于孔子的人格一种美学的欣赏，他的人格是怎么样发展，不是要就是要学他，而是他可以给我们灵感。”从这个角度来看，《论语》里面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有美学的价值、有伦理学的价值，同时有宗教哲学的价值。在西方的学术界，美学、伦理学和宗教哲学是三块完全分割的。美学是讲人的感性、绝情；伦理是讲道德的规约；宗教是讲信仰。我们要把我们的感情彻底地转化，才能够发展道德理性；我们要跳跃道德理性，通过信仰的飞跃，才能进入宗教的领域。但是在儒家所体现的这个人文精神，我们的道德使感是在我们的感情之中体现的，是在人文日常生活中体现的，不是一套虚幻的、理想化的、抽象化的道德说教，它每一句话都有实际的意义。孔子和他学子、学生之间的交通，就是要体现这一种人文精神。另外，真正的道德理念必须要向外推展，不仅从个人到社会，而且要推展到人类全体，甚至要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有一种人，一种终极的关怀，所以在儒家的思想，从《论语》所体现的美学、伦理学和宗教哲学是贯通的。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开始提出了在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是一个大问题，他的这个问题意识非常明确。人和一般的禽兽有没有分别？文化和非文化和野蛮有没有分别？真正的公益和重视唯利是图有没有分别？霸道和入道、王道有没有分别？就是《孟子》思想里面所体现的四个重要的辩论：人情之辩、夷夏之辩、义利之辩、王霸之辩。但是《孟子》所讲的，人和禽兽不同，人可能是从禽兽经过了长期的转化。我们说是经过演化发展出来的。那人从荀子的角度，所有的东西都有气，只有植物才有生，只有动物才有知，只有人才有忆，所以人除了气、物质的条件，除了生命、除了你的意志、你的情感，还有道义，所以人是在浮生物、生物、动物逐渐演化出来的，感性绝情最强的一种生物、一种动物。从儒家的角度，这种人他是具体地、活生生地存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是一个抽象观念，所以一个人一定有特殊的族群，他有性别，他有特别的语言，他有出生的地域，他甚至有他不同的阶层，乃至他的年龄带，所以这一些根源，每一个根源，对一个人讲都是塑造人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些条件不是限制，假如我们能把这些条件转化成我们逐渐成为一个在发展中尽量体现价值的人，那我们虽然是某一个族群的人，我们可以体现普遍人的价值；我们虽然有特殊的性别，但我们不会就是为性别所限制；我们有特定的语言，但我们的价值可以超

越语言；我们有特定的出生地，但我们对我们的出生地有非常深刻的情感。可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也可以通过转化超越我们的出生地，甚至我们的年龄带。因为这个原因，在《孟子》里面，他对两种思想进行了批评。一种可以说极端的个人主义，杨朱；一种就是极端的集体主义。他说我要走的这条路是一条中道，是一条仁义内在，性由心显。所谓“仁义内在”呢，就是这一些道德的价值不是只是通过一种外在的强制的枷锁教条，使我们成为一个有道德、有操守的人。我们每一个人的内部都有足够的资源，通过我们的自觉的反省来发掘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的仁信可以从我们心的最根本最有价值的一些感情来体现，比如恻隐之情、羞辱之情、是非之情、辞让之情。所谓事端特别突出同情，因此，孟子所为的人的价值是从“不忍”逐渐扩展到“忍”。我们不忍我们最心爱、最亲近的人受苦受难，可能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对路人、对其他的人，我们没有这种感情，可是我们希望把这种感情向外推，从不忍逐渐逐渐推到忍，不仅对所有的人受苦受难我们都不能忍，甚至对动物、对植物，这是我们的人逐渐逐渐扩展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非常具体，但是又有非常崇高的理想，把一个人的差的性和他人能够朴实化的，普世价值结合起来。我觉得在五四以后，我们有一种思潮，很极端的思潮，是从“忍”到“不忍”，先我们要忍敌人，我们甚至要狠打落水狗，慢慢地，即使我们的朋友之间有人他的思想不够前进，他的观点不够全面，我们也能够忍，到后来是不是我们的亲戚朋友，乃至我的父母兄弟。如果不是能够发展我们需要发展的一些社会理念，我们也能忍，这个和儒家传统原来所了解有非常大的差别。儒家的思想是从“忍”，从一种“不忍”慢慢向外推。所有的情在这个领域里面都有价值，不是简单的温情主义。真正的情是有价值的，但是这个情要向外推。假如不向外推，那它就变成自私自利，变成狭隘的家族主义、族群主义，乃至人类中心主义。如果向外推，它可以成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宽广的人文精神。这个精神在很多国内第一流的学者，到了晚年发现它的价值。比如冯友兰先生，晚年的时候认为“仇必和而解”，突出“和”，突出“沟通”的价值。甚至他要回到早年他所理解的张横渠所讲的四句话，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宏观的人文精神在《中庸》里面体现得特别突出。在《中庸》里面有一个非常明确而有价值的信念。如果我了解我自己的人性，如果我充分地了解我自己的人性，我可以了解一般的人性；假如我能了解一般的人性，我可以了解悟性；假如我能够真正地理解悟性，我可以“参天地之化育”，能够参加天地大化流星中的那种创生性，那种发展；如果我能够“参天地之化育”，则我“可与天地为三”，也就是说天、地、人可以成为一个全面的、整体的人文关怀。这个人文精神全副地开展，这一种人文精神一共有四个不可分割的向度，或者四个不可分割的侧面。第一是个人，如果你还记得那个同心圆的话。这个同心圆一个是个人、一个是群体、一个是自然，还有另外一个侧面是天道。它有四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呢，就是每一个人要通过自己的修身，使得身、心、灵、神能够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每一个人的事业，所以在《大学》里面，“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根本，这个根本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义务，使得我们的身心的和谐，使得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心知、我们的灵神能够配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另外第二个原则，个人和社会要进行健康的互动，而社会是从家庭一直到人类社会。这个中间是错综复杂，儒家特别突出家庭的重要性，不是说简单的家族主义。当代的儒学有很多思想家对家族，就是所谓“礼教吃人”的家族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判。康有为甚至认为，所有的儒人，儒家讲的儒人，都可以规约成朋友这一轮，甚至父子、君臣、夫妇、兄弟这些伦常都不重要了，要打破这个家族的困境。熊势利先生甚至讲得非常极端地说：“家庭为万恶之渊”。有很多在家里面对于妇女的歧视、对于年青人的一种暴力、对于弱势团体的不重视，这一些坏的事情在家庭里面出现了，我们要彻底地削减。虽然有这样一些现代

的情绪的一些观点，当然它有价值，但是人，一个个人如何和家庭、跟社会、跟更宽广的人类群体进行健康的互动，这个是每一个人必须要通过自己的修身哲学来发展的。

第三个基本原则就是人类全体和自然能够进行和谐、持久的和谐。再来呢，人心和天道能不能够相辅相成。这一种观点有的学者说“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大概在宋代才开始，在董仲舒就提出这个“天人感应”，“天人相应”这一种天人间的互动的观念。在文化中国，包括港台、新加坡华人的地区，一些最杰出的思想家，到了他们七老八十的时候，都提出了象钱穆先生在他去世之前，他说：“我有一个很大的彻悟，我的彻悟，就是说中华民族能够对人类全体的贡献是一个‘天人’的观念。”另外友兰认为天地的境界，冯是抑说：“最后我要回归到大易，《易经》里面那个生生不息、自强不息的创生的观念。”梁漱溟先生讲“人心与人生”。乃至唐君毅先生提出“人的心灵的九境，最高的境界，是那个道德流行，人和天能够合一”这种观念。我们可以这样说，从儒家所展现的这一个人文思潮，和西方启蒙运动所发展出来的以人类为中心的。儒家的人文精神是一种涵盖性的人文精神，要包括自然，也要包括天大。它走的不是是一条规约主义，在定义人的时候，它不把人只当作一个理性的动物。或者说这是亚里士多德讲的：“或者把人当作一个政治的动物，或者把人当作一个能够运用工具的动物，或者把人认为是一个可以运用语言的动物。”比如现在很多语言学家。在很早在古典的儒家思想，就把人的多元多样做一个全面的掌握。第一个，人是一个感性的动物，“天地万物人为贵”。因为他（她）是最灵、最有感性的，这种感性通过人的共鸣。人可以和人之间共鸣，人可以跟自然、跟生物、跟无生物进行共鸣。即使是无限遥远的星球，对我们也可以有感情的联系。这一种感性的情，在传统中的思想就是“施教于人，把人变成一个美学的动物，不仅如此，人同时是一个社会的动物，这是从《礼记》所体现出来的。我们上到大概五四以来批判吃人的礼教，是一种强迫压迫人，要人来做，压迫人来做，循规蹈矩的工作，而有一种强烈的霸权的压制感。另一个是“礼”观念的异化，原来“礼”的观念，人是一个社会的动物，一定要跟其它的人进行长期的健康互动。这个是《礼记》里面所体现的一些价值，人是社会动物，同时人也是一个政治动物，人作为一个政治动物，他是要在政治生活中。庄子甚至说：是无可逃于天地之间，在这个政治的环境里面生活。《尚书》所体现，最好的政治应该是属于人道的政治，属于清廉的政治，属于让各种不同的人都能够发挥他们的才智、发挥他们的价值的政治。同时人也是一个历史的动物，人是有集体的记忆，我们经过长期的集体的记忆，形成了我们今天的文化。

世界上有很多由古如今的文明，象巴比伦、象古埃及、象古代的希腊，今天我们要了解这些文明，我们要到博物馆里面才看得到；也有有今但古并不很长的文明，比如说是俄罗斯和美国，既有古又有今；而渊源流长的文明不多，有印度的文明、有中国的文明。而中国文明历史历史意识特别强，所以它有强烈的沉积性。可是现在我们碰到困境，就是两三千年来悠远的历史和近百年来集体的健忘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我们的历史非常悠远，非常长，源头非常长，可是我们近代一百多年的记忆非常短暂，这是一个很大的困境。同时人也是一个能够超越，象超越，有一种对超越的向往，对理念的追求、价值的追求，同时有一种终极关怀，这就是《易经》所体现的人的价值。所以以前中国的《六经》，事实上可以说体现了六种不同的人文价值和人文精神。人是感性的、是美学的、是施教的、是礼教的，人是有社会性的，人是有政治性的，人是有历史性的，同时人也是有超越向往终极关怀的动物。这一个思潮在古代中国展现以后，成为人类文明重要的人文遗产。到了宋明一代，就从十一世纪到十九世纪，这个思潮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而岳麓书院可以说是对于这一发展作出极大贡献的，在人生观和宇宙观方面，特别地突出。当时在宋明时代提出：“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同时它所讨论的“气、理、心、性”，都不是一些我们现在认为的抽象的形而上的、跟我们人人世界没有关系的理念。这些所有讨论的这些问题都和我们日常生活，不仅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就做人，有密切关系的价值。当时朱熹，

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时朱熹和张氏，张兰轩就在岳麓书院进行了三天三夜的辩论、讨论，讨论这个《大学》里面的问题，讨论《中庸》里面的问题。讨论什么问题呢？就讨论综合的问题，这个综合的问题是情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恻隐之情，都有羞恶，都有迟讷，所谓事端之情，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喜怒哀乐，这两种不同的情，我们怎么去理解它？一种呢，譬如说我们就突出恻隐，恻隐这个情呢，越多越好，我们越有爱心，我们越能够有同情感，我们越能恻隐，那我们就越象人。另外呢，喜怒哀乐那种情，假如我们不调节，我们不转换，那个情可以伤害我们的身体，可以使得社会发生各种不同的困境。所以有一种情是越多越好，有一种情呢，我们要转换。这一些讨论，后来在中国并没有很好地发展，当然有很多的讨论。但在韩国的儒学有一个叫做“事七之变”，就是事端和七情，它的关系应该是什么？发展了一些非常复杂、非常有趣的一些理念。这些观点都是和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在人人日用之间来安排我们的感情生活、我们的理性生活、我们的社会生活，我们的个人生活怎么样和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亲友能够进行健康的互动完全联系在一起的课题。它这个提出来，如果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以人、以爱心和关怀来发展人的道德理念。王阳明的《大学问》，王阳明在他被贬到贵州之前那一年，也在岳麓书院做了报告。他的《大学问》里面特别提出“一体治人”，从亲亲人、亲人民、爱物开拓出去，发展出去，“一体治人”，这个“一体治人”的这个观念呢，又是有分别的。一方面是和天地万物合为一体；另外呢，这个中间又有非常明显的分疏，远近的分疏。这个非常现实，但又有非常深厚的理想主义，同时配起来。它不是种浪漫主义，不是一个个人主义，而是一种非常高深的哲理。但是那个高深的哲理又能够在人伦日用之间能够发展。孔子在《中庸》里面引了他一段话，他就说：“有很多每个人都应该做得到的，但我并不一定做得到。就是在对我的父亲，对他的那种尊重，我希望我的孩子对我一样，这件事情我想还办不到；我对一个我的君我应该尽忠，但是我期待我的孩子，期待我的臣对我一样地尽忠，这个我还办不到；我对我朋友的信，我希望要求期待我的朋友对我的信，这个我还不能办得到；对我的兄，我要有一种敬重之感，希望我的弟弟能够对我这样。”这个都是非常简单的人伦日用之间，我们每天都碰到，但是每天所碰到的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价值这个关系又有非常深刻的内涵，我们需要慢慢地去陶冶它。如果社会上没有这种价值，没有这种理念来陶冶，这个社会是很难安定很难发展的。这个观念非常平实，但是它又有非常深刻的哲学意涵，我们认为，儒家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可以为文明对话提供非常丰富的人文资源。联合国最近决定了公元2001年是世界上的文明对话年。假如我们认为不同的文明有冲突的危险，当然有冲突的危险。不同的族群、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地域，都可以有冲突矛盾，假如我们认为有这个危险，那对话更是必要。目前，如果想要开放、开发儒家的人文的精神资源，为文明对话创造良好的条件，我们必须发挥全面而深入的批判精神，使得儒家传统能够很成功地进行一个现代的转化。这个工作在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一直投入，一直在做，这个非常艰巨的工作。也就是如何使得儒家这个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和从启蒙时代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从欧洲发展出来的启蒙的这个人文精神，包括自由主义的传统和社会主义的传统进行对话。西方的启蒙提出了自由、理性、法制、人权和个人的尊严，这些价值现在在世界各地都认为是普世的价值。现代化是一个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和个人权利充分发展的一个运动、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发展中，这一百多年来，从鸦片战争开始，很多中国的知识精英，发现儒家的这个人文精神和中国的小农经济、家庭的伦理和权威政治乃至集体主义纠缠在一起，在中华大地出现了很多消极的因素，使得它不能够充分地现代化，来掌握西方所提出的一些非常有光辉而且能够普世的价值，所以强烈地批判儒家，当作封建的遗毒，当作阻碍现代化的绊脚石、自由主义的宏石。社会主义的陈独秀，大文豪象鲁迅，这个从五四以来，

一直在进行。如果我们想要把儒家的人文精神进一步地阐发，我们要对他们的批评所带给我们的教训全面而深入地加以体认、加以反思。我们如果不能使得儒家的人文精神，我刚刚讲的理想中的人文精神，和小农经济的保守主义，和一些不健康的家庭伦理，比如说是男性中心主义、权威主义，政治权威主义和集体主义脱钩，让它充分地发展，这个将来儒家的人文精神能够成为人民对话的资源，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小。可是现在，就当代，在西方的一些核心的思想家对于西方的启蒙心态开始进行了一个也非常深刻的反思。从这个生态环保的角度来看，人类中心主义完全以人为中心，西方所代表的那一套启蒙精神，不管用，一定要超越。从女性主义的发展，发现启蒙所带来的精神有强烈的男性中心主义的色彩，这个怎么样削减？从多元宗教的角度，怎么样让启蒙以来的精神能够多元地开放，而不是一种狭隘的西方霸权？从族群伦理来看，怎么样能够突破极端的个人主义？在西方的学者在进行这样子深刻的思考。中国的学者、日本的学者、朝鲜的学者，就儒家文化的学者，一百多年来对自己传统文化中间的阴暗面，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判。我们现在可能一个新的综合的出现，一个新的对话的条件出现，我举一个实在的例子来说明这一个可能性。

九年以前我在我服务的学校哈佛大学的中心课目，我提供了一个课，就是《儒家的人文精神、修身和性爱色群》。在这个课里面，我突出了儒家的一些基本的价值。在九年以前，我进行一个简单的调查。我们大概每一次总有四五百，跟各位差不多，四五百个同学，各个不同的领域，各个不同的年级。我问他们：在你的价值思考中间，自由这个观念是和公益平等的观念哪一个观念更重要？两个观念都重要，但是你一定要选择是哪个观念比较重要。理性和同情这两个观念你怎么来选择？法制和礼教，礼教不是吃人的礼教，是礼约教化的礼教。人权和责任、个人和群体，你怎么样选择？在九年以前，75%的哈佛大学的大学生，有的是理工，有的是文法，选择自由、理性、法制、人权、个人。今年这个五月，再作了一次调查，有50%以上的人选择公益，不选择自由。因为美国社会的这个自由度比较大，大家发现的社会不平均、社会的矛盾斗争、族群之间的冲突太厉害。有50%，特别是女性，70%选择同情。同情比理性更重要，只有理性没有同情，你不能发展你的这个道德价值。法制和礼教差不多相等。人权和责任还是权利高于责任。人权重要但是已经相当接近，把人当作一个关系网络中心点，而不把人只当作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这个思想也在上升，现在有45%到50%接受“人作为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所以和儒家，我现在要说，刚刚前面描述的儒家一个基本的价值动向，很多地方非常相契。什么原因？并不是说现在美国的学生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个根本是不可能的。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人说不太可能。可是正如我前面说，因为生态环保，因为女性主义，因为多元的宗教，因为社群伦理的发展，逐渐逐渐使得西方过分突出自由，过分突出理性、法制、人权和个人主义，开始认识到其他的普世价值。这些其他的普世价值包括公益、平等、同情，就是礼貌、礼教、责任和群体，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情况。这次回到祖国之前，我曾经在汉城参加了联合国科学教育和文化委员会组织的全球伦理的研讨会，这个全球伦理的研讨会在韩国举行。主要呢，是想通过文明对话来了解能不能够建构一个全球社群。假若我们的全球社群已经出现了全球社群共同的核心价值，有没有我们共同的这种核心价值？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是韩国开，特别探讨儒家的人文精神能够向全球伦理的出现这一个方向努力提供什么样的精神资源？这些学者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得到下面结论。就是在1993年，世界宗教学术大会的时候，有6000个学者参加，最后大家得到两个共同的信念。就是人类社群如果要进一步发展，两个基本原则我们必须推进。这两个基本原则和儒家的基本价值是可以配套的。第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最近张岱年先生在人民大会堂参加讨论这个儒家伦理，他也提出来。除了这个是恕道，恕道不仅是儒家伦理，也是犹太教的伦理，和基督教的“己所欲施于人”不太同，但是也可以配合。也和

这伊斯兰教的价值有密切的关切。也就是说“我以恕道待人”，对于我讲很好的东西，对于我的亲友不一定很好，我要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其他人的情况是如何，这就是推及及人的基本价值。儒家的人道就是这个价值。但是这个价值后面还要另外有一个价值，就叫“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不是利他主义，不是说我现在在掌握足够的资源，我要想办法，能够和其他的人分享，这是完全为发展我自己的人格。但是我是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我不能够只是自私自利地发展我自己，到最后我没有办法发展我自己。如果要发展我自己，我一定要发展和我周围有关系的人，逐渐圆圈要扩大。另外更值得注意的，就是儒家传统里面有一种“为千秋万世”，比如说是张载所为的“为万世开太平”。也就是说我们人类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能只考虑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要为我们的子孙考虑问题。非洲有一个谚语，地球呢，不是我们的祖先所赋给我们的财富，地球是我们千秋万代的子孙委托我们保存的财富。我们考虑伦理的问题，不能只考虑我们这一代，也不能只考虑过去，要考虑未来。儒家思想这一方面，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发展。那么这些资源如果具体地要发展，要靠什么样的人来发展？是靠少数的知识精英吗？是靠政治领袖吗？是靠企业界里面有权有势的人？靠媒体？靠什么？我们认为，如果要发展，要靠一个广义的公众知识分子。所有各位在这儿的，都是属于广义的公众知识分子，什么叫做广义的公众知识分子？就是一个对政治，关切政治，你不一定要从政，只关切政治，能够参与社会，同时注重文化，就是属于公众知识分子。这些人不完全在学术界，学术界有很多人成为专家、学者，他不一定要扮演这种角色。所以这种公众知识分子呢，不仅在学术界，应该在媒体，在政府，在企业，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同时各种不同的社会运动，包括环保的运动，女权运动，对于弱势群体怎么样子协助他们，怎么样子帮忙他们的运动，消费人的权益的运动。这些都是使得我们能够逐渐地为文化中国，为广义的中国文化来创造资源，来开发资源。有了这种创造，这种开发，我们进行文明对话就有了基础。正因为如此，我感觉到现在如果想要使得广义的儒家的人文精神成为人类文明将来塑造全世界都能够共享的基本价值，必须在儒教文明圈的内部进行发展。我们必须减少内耗，把它积极的因素发扬起来，慢慢地通过各种不同的领域，来形成论域。

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以来经过了许多的屈辱，许多的悲愤，经过了这段时间，现在正在腾飞。中华民族的再生是一个经济现象，是一个政治现象，同时也有深刻的文化含义，而这个文化的含义正是可以通过儒家的人文精神和很多其他在中华大地所发展的价值。佛教的，道家的、社会主义的，基督教的，各种其他的领域，来共同发扬。谢谢各位！（掌声）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杜教授的精彩讲学。正如我们岳麓书院的楹联所说的那样，值得我们“藏之名山，纳于大陆。”接下来我们将进入观众自由提问阶段。

主持人：好，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观众发问的阶段，我看到网上的朋友已经非常踊跃地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在这里有一位这样的观众想问杜教授一个问题，我代为转述一下。杜教授，您不同意亨廷顿文明冲突的说法，强调应该以文明之间的对话来代替冲突，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但是在这里想请问一下杜教授，具有不同价值取向和信仰的文明之间怎样才能对话呢？我想他的意思是说，在不同文明之间误解和隔膜仍然比较严重的这种现状之下，文明怎样才能避免冲突走向对话？

杜维明：非常谢谢。这也是一个非常很有挑战性的问题。我和亨廷顿教授因为是同事，已经辩论过很多次。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其实他也接受，假如有文明冲突的可能，文明对话成为必要。如何能够进行文明对话？现在在西方有两个思潮，一个就是所谓历史终结。西方资本主义所代表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个人主义已经占了上风了，只要全世界其他的地方都学这一套，能够现代化，能够西化，那就没什么文明冲突。另外呢，亨廷顿说不一定。有两个大的文明，和西方文明会可能进行冲突。一个呢，就是

伊斯兰的文明，包括中东和亚洲的伊斯兰教；另外呢，就是儒家文明，儒家文化圈，包括中国、越南、北朝鲜，还有韩国，甚至有一部分可以包括日本，都整个受到儒教文化圈的影响，我认为从这个多元的景观来看。西方的一个哲学家叫雅斯贝尔斯，在1957年，他说世界上有四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在塑造人类文明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对这四个思想家，不管你是属于哪一个文明体系，都应该有所了解。他所谓的四个思想家是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孔子和耶稣。如果我们要扩大这个范围，应该也包括穆哈默德，包括摩西，包括老子和庄子。这个很明显地是不同的，但虽然不同呢，他们可以进行对话。基督教和回教和佛教来进行对话，那么在这个对话中间呢，儒家文明可以起一个中介的作用。什么意思呢？在平常基督教和回教对话，或者是回教和佛教的对话，双边是属于哪一个宗教的，这非常清楚。儒家参加了这工作以后比较复杂。比如说，我第一次参加儒家和基督教的对话，在代表儒家的很多学者中间有相当大的比重是基督徒，他们说：“我们是儒家式的基督徒。”现在也了解到也有儒家式的佛教徒，也有儒家式的伊斯兰教徒。什么叫儒家式呢？如果儒家式的基督徒，也就是说他是比较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你既然有这个儒家式的佛教徒，儒家式的基督徒和儒家式的回教徒，儒家这一个人文精神可以在文明对话中间起一个中介的作用。这并不是说由儒家的思想来统合，不可能的。但是他可以起一个中介的沟通的作用。这种工作我们现在慢慢开始了。所以最低的要求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同时可以通过“己欲利人，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来形成一种健康互动的可能。所以这个是一条路，我一直在做。我们在马来西亚已经有了回儒的对话，在美国有个基督教和儒家的对话，最近在以色列也有犹太教和儒家的对话，这个工作很艰巨但是有可能。

主持人：谢谢杜教授。刚才导播告诉我，场外的观众也非常踊跃地打来热线，导播挑选了这样一个问题，由我代为转述一下。杜先生，您作为当代大儒，在全世界很多庄严神圣的讲坛上发表过演讲。您今天来到了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在当年朱熹讲学论道的地方谈儒学，谈文明的对话，您有什么样的感想？您对岳麓书院所代表的湖湘文化在中国文化未来发展中的作用中有什么期待？

杜维明：我当然一方面很感激也相当地激动，能有这个机会。等于是上有千古，面对朱熹和张栻在辩论的这个氛围里面，来进行关于文明对话的讨论。我虽然参加了很多次，我想有这种机会是绝无仅有的。我们最近希望再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地方知识它能够发展一个全球的仪，就是地方知识的全球仪。这个和儒家的精神有很密切的关系，就是一种思潮、一种经验、一种价值，它有强烈的地方性，强烈的根源性，但是它同时又为世界各国的人所关注、所重视。现在在世界上面很多有普世意义的地方知识都是来自西方。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西方的后现代化理论、西方的结构理学、西方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各方面的理论都在全球各地方发展。面向二十一世纪，是不是有具有东方特色，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价值、一些理念、一些经验能够成为全球大家所共享的精神资源？岳麓这个地方从古代，象屈原《楚辞》所代表的精神文明，荆楚一带的精神文明，通过这个马王堆的材料发掘和最近国电的发掘，就是在春秋战国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中原文化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但是它有它的地方特色，而这个地方特色在宋以后越来越明显。在宋明理学里面，象周敦颐，到后来发展到王夫之、魏源、曾国藩、谭嗣同，当然还有毛泽东，在这个地方所发展的具有长沙湖南特色的这一个地方知识，不仅有全国的意义，从全国来看有非常深厚的意义，也有这个国际的意义，所以它是一个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从这个角度上看的，就是根源性非常强，而普世性很强的价值可以在这边充分地发挥。我认为这个价值是非常深厚的。

主持人：好的，现在的现场观众呢可以自由发问了。请大家举手提问，好的，那一位。

观众：杜先生你好，我这问题很简单。我想请问杜先生，您如此不遗余力地推行您的新儒家学说，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促使您这么做呢？谢谢！

杜维明：其实如果说我在宣传，在推行儒家的话，可能不是完全的，不是很确切，因为我的心愿是想了解，通过了解认识来发掘它的资源。那么我可以是这样说吧，我的这个动机，如果有动机的话，是一个人文学的动机。因为我觉得人文学，在传统中国讲是文、史、哲，这个文、史、哲呢，是对人的自我反思、自我理解、自我认识最贴切而最直接的学问。可惜现在在文化中国各地是用科技挂帅，所以对这个人文学的价值体认得不太够。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美国十个精英大学，最突出的精英大学的校长。比如说哈佛大学的校长，我们的校长，是英国文学；哥伦比亚的大学的校长，我很熟的一个朋友，以前是哈佛神学院的院长，现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他是神学家；史丹佛大学的校长是法律学家；麻省理工大学的校长他是经济学家。十个大学的校长除了加洲理工学院的校长以外，因为他没有文法，都是社会科学人文学。美国是一个非常现实，非常实际的国家。为什么？我一直在问，为什么他对人文学那么重视？为面向二十一世纪，如果你不能发展文化资本的话，文化能力，不仅是科技能力，不能发展伦理价值，不能发展这个精神文明、精神价值。只是发展科技，只是发展经济，这个将来在复杂的现代社会是没有办法稳定前进的。那么在文化中国，各地方如何开发它的精神资源？如何能够创造它的价值领域？这是我一直的关切。儒家的传统就是经过现代转化的儒家的传统，面对西方的挑战，它有很多非常丰富的资源。所以你说我的动机去宣传它，并不是因为我一种信念，就是说它一定好，我一不批判它，我就尽量去宣传它，作为宣传家。我认为确实从问题意识上面，它正好碰到了现在中华民族在腾飞的时候它所传达的文化信息，需要在储积精神资源这方面开发。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比较花一点力量来讲这个方面的道理。谢谢！（掌声）

观众：杜维明先生你好！我是湖南大学机械汽车工程学院本科应届毕业生，在这里呢，我个人非常希望您的观点是正确的，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假如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英国姑娘在这里追求我，而我本人也不是什么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那么我想请问您，我怎样才能将这场爱情进行到底？谢谢！（掌声）

主持人：这种跨越东西方文明的爱情怎样进行到底？

杜维明：因为我自己也是国际婚姻，所以我可能可以现身说法。（笑声）

不过这个，假如你认为她很漂亮，表示你的主观的感觉已经相当好了。假如她使你坐怀不乱，哦，不能坐怀不乱，表示你已经动心了。（笑声）如果她正在追求你，我的感觉，你还想逃吗？应该勇往直前啦！（掌声）不过我要了解到这个跨文化的这种友情和交情，我很了解这个情况。就是从行为、从态度，和从信仰各方面是有相当大的距离，所以这个不能掉以轻心啊。是不是说这国际婚姻造成了家庭内部的文明冲突，这个东西要小心，那么要增加了解，也要有相当的心理的准备。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个人的一个例子。我到了印度去进行学术交流，很多年以前第一次到印度，我现在到了印度好几次。那么当时我到了印度碰到一个哲学家，我就把我的一些很不成熟的理念讲了一遍。我发现他完全不赞成，所以我用另一个策略又来讲一遍。看起来他还是不赞成，所以我想用第三个方法。我正在进行的时候，他说杜教授你刚刚讲的我完全同意呀，你为什么又讲了一遍？我说你不是一直在摇头吗？他说，这是我们印度人说“是”啊，这“是”，“很好很好很好”。所以我认为不是的话，我会把这个头向上一仰。我没有了解他的文化的信息，所以我跟他那个时候没办法进行交通。假如你有意愿，当然还有一点勇气，有一点浪漫的情调，要有国际的友情和国际婚姻的话，你要有心理相当大的准备。如果这个女孩子来自英国，那你确实要对英国文化有相当的理解，也希望她对中国文化相当理解。而且很多文化上面可能发生的冲突，在你们的交往的过程中间，让它减到最低。这样的话，可以创造一些真正的许多文明对话而不是文明冲突。（掌声）

主持人：好，谢谢杜教授幽默风趣的现身说法，看来，东西方文化的交融，杜教授是首先从个人做起，好，接下来，请观众继续提问。

观众：杜教授您好，刚才您在演讲当中，我们注意到，您提出了“公众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而且热切地盼望广大中国知识分子能够成为公众知识分子。那么，我想请问，您认为如何才能成为公众知识分子？您自己是不是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公众知识分子？您是否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走出书斋是中国知识分子承担文化使命的一种必然选择？谢谢！（掌声）

杜维明：我想如果从这个最低的要求，我们大家都是公众知识分子。最低的要求，就是我们关切政治、参与社会、重视文化。这个看法跟这个葛兰西他原来讲的有机知识分子是同样的。这个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精英的观念，不是精英种类的观念。他所谓的这个有机知识分子就是来自工人的、来自农民、来自企业，但是对他的职业，对他的环境进行比较深刻的反思。所以这个意义下，所谓的公众知识分子，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在这都是属于公众知识分子。但是你要说是比较高的要求，等于在儒家里面讲，“人人皆可为圣”，每个人都有。或者佛教讲，“人人皆有佛性”，但是你要真正能够充分体现那个过程，当然是非常复杂的。我并不建议说我们要离开书斋，到公众领域摇旗呐喊。其实我们现在是要花很多的精力来进行一种虔诚的、长期的知识的积累。特别是近来中国各方面的运动太大、太多，我们没有积累，正因为我们没有积累。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薄弱，我们的价值领域比较稀少。但是除了积累以外，我们不能只是通过职业、通过我们自己的事业来发展人文价值，我们要另外还有更宽广的关怀。假如有一批学者，他不愿意扮演这个在公众领域里面、在媒体各方面扮演这个公众知识分子角色，他们不仅有这个权力，而且我们有义务保护他们，让他们在最好的学术环境里面发展他们的学术，因为将来他会为文化中国储备更深厚的资源。在另外一方面呢，假如我们没有一种各种不同领域的合作，即学术界、政府、媒体、企业、社会，还有各种不同的社会运动进行合作，把这个文化的理念发展出来。比如说“科教兴国”，和“科技兴国”是绝对不同的。科教的“教”应该是教育，而教育应该是人文教育在内的一种人文素质的培养，通才的教法。这些价值你不能靠上面少数的人，通过他们的主观意愿来传达，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为这些价值创造条件，从这个方面讲，我们需要有一种公众知识分子的出现。我们现在发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这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仅是在中国，因为这个观念叫做 **Public internektu**。这个观念是在美国我们讨论得非常多的。这种人格的形态，既非古希腊的哲学家，因为哲学家是一个精英的观念，也非西伯来文化的先知，先知的话，他听到的上帝的声音，但是他要把上帝的声音传达到下面，要通过他的诠释。我们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也不是一个僧侣阶级，也不是一个印度所谓的长老，也不是以前俄罗斯所说的 **internektu**。因为俄罗斯所说的知识分子呢，一定是反对政府的，一定是批判政府的。而我们现在要讲的呢，不仅是在学术界，也在媒体、在企业、在政府各方面大家通力合作，来为这个文化发展一些新的价值，所以这种意义下的公众知识分子要发展公众领域，但是这个公众领域它是一个比较全面性的，所以这种意义下的公众知识分子要发展公众领域，但是这个公众领域它是一个比较全面性的，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责任来进行这样子一个工作。谢谢！（掌声）

观众：杜教授，你好。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就是当代的大学教育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教育。在校的大学生也在被告诉如何训练成为一台能够成功赚钱的机器。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大学校园里面，正在进行文化素质教育，你有如何好的建议？谢谢！

杜维明：谢谢你的问题，就是你如果说一个现象的描述，国内的情况我比较生疏了，但这个很符合美国的现象，说学校变成一个赚钱的机器。比如说哈佛大学现在在美国的学生中间影响很大的，是 **Bill Gates**。中文翻译叫盖茨，他是我们这个哈佛大学二年级就退学了，不愿意再上，他认为上学无用，他可以赚得比你在学校里面念四年赚得更多，那么现

在当然他是一个大财阀。哈佛呢，我觉得是很不幸的，有些人认为很不错，哈佛也很有名气。但如果严格的说，它有的时候可以说它恶名昭著，什么意思？我这个不是讲得露骨。就是哈佛的名气是钱和权，因为哈佛有名的学院是商学院，是教你怎么样赚钱。另外是甘乃地学院，是专教你怎么样掌权。哈佛的校长要到北大访问的时候，去年，我们进行的学术界里面就是学校里面进行的一次讨论，我觉得这个是，我认为是奇耻大辱、奇耻大辱，哈佛整个形象就是一个钱和权。因为真正这个学校能够成为300多年来的一个重要大学，它是靠它的文理学院，而这个文理学院里面是讨论的是知识的探求、价值的推寻。当然发展个人的企业各方面的意愿也在中间，不是完全钱和权的问题。其实在儒家的传统来看，在中华，就在中国历史上面，它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在钱和权之外开拓了一个领域，就是一批人既无钱又无权的人，但是通过它的教育，通过它的理念，它在社会上发生极大的影响。朱熹、王阳明在早期的孔、孟都是如此的人。假如一个大学，只能够培养一些惟利是图，大家对这个人文学的文、史、哲，对于其他通式教育所需要的素质教育都不关注，整个变成一个学店了，变成一个训练班了，有的时候你就到这另外一个技术学院去学，你就跟比尔·盖茨，现在就去学，那这个机会好得很。你到一个大学，花那么多时间，干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呢，现在哈佛在做是一个非常深沉的反思，我们认为商学院只能够培养赚钱的人是我们的耻辱，所以商学院现在开始说，要培养是培养企业界的领袖，不是培养企业界里面能够为大公司行号赚钱的人。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当然可以，他在其他地方还可以，所以这个非常深刻的反思。我们这个过程很难。因为有些聪明才智只是到了又有权力又各方面机会很好，所以钱和权很突出，但是真正它的灵魂确实不在这。那么我们希望商学院它能够培养企业的人才，我们就希望它的甘乃地学院能够培养有责任感的领袖，这个可能性还是有，我讲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这个什么例子呢？就是杰克·列蒙，很好的一个演员，很有名的演员。他哈佛毕业以后，到纽约去赚钱，他没有希望。结果他的父亲看他，他的家里只有一张床，就一个凳子。他的父亲，是一个企业家，很伤心：“我花了那么多的钱让你念哈佛，出来以后，你一无所有。”他就想做一个演员，做演员非常困难，但是毫无疑问，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变成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在很多地方讲起来，他体现了更多的价值。谢谢！

主持人：谢谢！（掌声）

观众：杜教授，您好，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现在中国的商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理想，就是想成为一个儒商，乃至一代儒商，我想请您从文化的概念上，能否谈一下儒商的这个“儒”跟儒学的“儒”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同一个概念？另外您对儒商的出现持何种看法？有什么评价？好，谢谢您！

杜维明：在1995年联合国邀请我参加了世界社会发展沟通会议，在哥本哈根，中国有30个代表，都是属于企业界的，都是年轻的，30多岁的代表，我和他们进行了一次座谈。他们说你知道我们都是儒商，哎，我觉得非常惊讶。所谓儒商呢，就是有文化、理想，有文艺化担当的企业家，这个观念在传统有，现在在国内、在国外发展得非常好。在1993年我参加了第一次世界的华商大会，是在新加坡的，后来在1995年在曼谷，97年在香港，后来在温哥华，最近在悉尼，都开了，每一次都有上千人，儒商的这个问题成为大家讨论的重点。我说儒商用我的话讲就是企业界的公众知识分子，他一方面关切政治；一方面参与社会，同时他要为文化创造条件。山东最近举行过一次国际儒商的学术会议，就在济南，而且成立了一个国际儒商的学术研讨会，现在还有一些学人在办这个儒商大学。另外，马来西亚在三年前举行过一次海外华人，世界华人的儒商会议，所以儒商的这个观念我觉得很重要。常常人们有一个错觉，认为儒家是歧视商人，重农轻商，我觉得这个是不正确的。法家注重“耕战”，就是注重农民和军人，对于其他的领域它不重视。但儒家老早就是“士农工商”，农是生产，工是制造，商是通有无，都是社会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的职

业。当时最难说明有价值的是士，你又不生产，你又不造作坊，你又不通有无，你是吃闲饭的人，怎么办？所以孟子就说你不要把这些看淡了，这些人可以上下合流。他的意思可以有这个天地的境界，他可以开拓价值的领域，他可以使人民的一些基本的理想开发出来，甚至可以批评这个现实政权。从这个角度上面，士也有他一定的价值，所以士农工商在儒家都很重要。到了明代，象黄宗羲就是“工商皆本”了，商也很重要。所以我觉得现在企业的发展是靠儒家式的企业家，特别重视文化的塑造，他这个企业的发展不是完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且要为社会的其他文化事业创造条件。譬如我们最近参加的几次学术会议，不管是国电的会议，或者北京的会议，都有很多的企业家加入。在岳麓书院捐赠的一所孔子的铜像，汤恩加先生也可以很明显的是一个儒商，同时他是一个儒教大学的校长。（掌声）

观众：您好，杜先生，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如果说人们能够接受您刚才所讲的儒学的精神的话，那么您认为，人们应该更多地是从理性的层面上来接受，或者是从文化情感上来认同？谢谢！

杜维明：这个问题，我曾经考虑过，但是考虑得不是很深刻。第一个就是从现象来了解，到底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大家的反应如果是同情的反应，他是一种经过理性的思考，认为你有说服力呢？还是因为民族或者其他感情的因素使他比较容易接受？当然我自己的期待是这样的，就应该是两种因素，应该配合在一起。以前有一位学者叫列文逊，他曾经描述过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困境，特别在研究梁启超。他说梁启超呢，是在感情上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在理智上面完全认同了西方的文化。因为在感情上和中国文化联系，他那个理智的批判不够。因为只是在理智上认同西方的文化呢，感情的热力不够，这样他两方面都落空了。那我们现在需要什么呢？需要儒学的传统不仅有生命力，而且要有说服力。所谓说服力的意思，它要经过一个非常严谨的学术思考的辩难，把它的一些糟粕充分地涂写，同时把它的精华进以开发。事实上我自己认为从“五四”以来，中国杰出的精英对儒家传统的批判不仅不是太过火，而是不够。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时很多的知识精英认为传统的包袱要丢掉，我们才能够现代化。把传统对我们的不健康的影响当作包袱丢掉一丢了事，是把传统的那个阴暗面，它那个腐蚀的力量看得太简单。因为它已经流入我们得血液，到我们的骨髓，一丢了之不可能。一定要经过深沉的反思，才能把它传统的阴暗面去掉，否则它是泛滥成灾。你看当时鲁迅所讲的国民性那些问题，这个几十年来不仅没有被消除掉，可能变本加厉。那么另外呢，我和五四的知识精英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说你要对传统那么严厉地批判。你不要忘了，你要开发传统的资源，从感情从理智来开发。那个资源，精华的资源不开发，你只是去批判它。你如果对传统是粗暴的，你对西方所引进的价值也是肤浅的。假如你对传统有深刻的理解，你对它阴暗面进行长期的批判，对它的智慧进行一种开发、一种沉积，那你对西方的价值有更深切的理想，你对西方所带来的一些阴暗面的东西可以彻底地扬弃，所以这个两方面必须配合。（掌声）

观众：您好，杜先生，我是师大的博士生，我着手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国民现代改造问题，所以我想问杜教授一个问题，请问您在当代和未来，真正具备有您所说的儒家精神的将是些什么类型的人？好，谢谢！（掌声）

杜维明：你的问题是说就是到底是怎么样类型的人才是说具备有儒家的这个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这个我自己在想，如果说是一个新型的儒家的人格，我觉得应该是能够有一种自由开放的胸襟，同时他有强烈的责任感，不是他的自由开放，不是说就是随便的批判，而是强烈的责任感，同时呢，他有一种同情和爱心和人道。这个三个，一个是自由开放，一个是社会的责任，一个是一种爱心和仁德，必须要配合。在儒家思想里面，长期地认为一个人不是一个孤立绝缘的物体。但虽然不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这个人他的价

值，又不应该而且不能够被社会的社会性所削减。比如说在新加坡，说这个是属于儒家价值，就是说个人服从社会服从国家我认为这不是儒家价值，儒家的价值是个人的尊严是不可削减的。如果社会腐化了，比如说屈原，“众人皆醉我独醒”。这社会腐化，我跟着它腐化吗？我的独立人格怎么能建立呢？孔子说，当时所谓这个“匹夫不可夺志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就一个完全没有社会地位，完全没有学术传统的人也可以站起来为他自己的原则、为他自己的人格，能够发扬他的抗击精神，那么这个价值在儒家。特别现在我们在出土的这个纸氏纸。纸氏纸跟鲁穆公谈话的时候，鲁穆公问他何谓忠臣，纸氏纸说“恒称之为恶者为忠臣”，就是一直在批评这个君王。所以鲁穆公觉得很不高兴，就问了另外一个人说：“纸氏纸那么重要的学者，说一直骂我的骂君的这个叫做忠臣。”后来这个重要的儒者说：“一个为你服务的人可以为你牺牲，但是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前途，一个人假如他一直在批判你，而批判更为高远的政治理想，这种人太难得了。”儒家有这种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精神，它是自由开放的。但是这种自由开放和自由主义、西方自由主义所讲的特别突出权利，突出个人，而不顾重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它是有责任的批判。有责任的批判表示韦伯所讲的“责任伦理”，他这个“责任伦理”就是他对他所批判所造成的后果他要负责任，而愿意负责任。不是说批判到底，这个完全不负责。

这一种有批判性、有自由开放的心灵、有责任感的人一定要有非常强的同情心、非常强的爱心。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开始这个发生各种不同的分化，就全世界各种不同的分化。一批有权有势能够掌握信息资源、观念资源和其他的物质资源的人，假如他们除了责任感和自由开放心灵以外没有爱心，没有一种为弱势群体服务的一种信念，那这个社会将来越来越糟。美国现在碰到一个很大的困境，最有钱的人、最有权的这些人，他可能有责任感，从法律的角度有责任感，他没有爱心，他不愿意把他的资源放在更宽广的世界来开发这个世界。从全球来说，现在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西欧、美国乃至现在工业东亚各方面的发展和非洲其他地方的穷困形成一个非常尖锐的对比。

如果这个社会要真正重组，一种新的价值的出现最少我们不能以我们的幸福建立在我们更痛苦的民族的痛苦上。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有一种更宽广的一种价值的出现。因为现在在社会上，特别是美国，有这个“中国威胁论”。因为中国的兴起一定把这个资源重新分配只是为了中国的前途。但是我认为假如我们传统深厚的儒家的人文精神能够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发展应该为人类全球创造更好的发展的条件。（掌声）

主持人：好，谢谢杜教授，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可能只能回答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了。请现场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赶快举手示意。

观众：杜教授，你好！今天你谈到了文明对话的问题，我联想到了另外一场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对话。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和日本学者池田大作他们之间进行了对话，他们展望二十一世纪，得出了“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的结论。请问您对这个结论有什么样的评价？谢谢！（掌声）

杜维明：池田大作现在他大概快有 80 岁了，但是他和汤恩比进行对话是三十年以前的事情。汤恩比和他对话，他是担心这个基督教文明可能会没落。所以他提出这个“中国世纪”实际上是为西方所敲的一个警钟，和亨廷顿的观点有些地方相合的。“中国威胁论”，西方的文明会受到儒家的文明，受到伊斯兰文明的冲突。但是我自己的感觉这样，我不能接受将来面向二十一世纪，这个文明是中国人的文明，或者说是亚太人的文明、亚洲人的文明。我认为这是全世界的文明，它不是一个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问题。现在文明多元地发展，就是中国的文明、亚太的文明、儒家的文明和这个基督教的文明，犹太教、回教、佛教文明必须进行对话、进行参照。在十八世纪的很多欧洲思想家总以儒家的文明和中国的价值作为他重要的参考系。现在我们实质上不仅要以西方的文明作我们的参考，日本文明为我们参考，他们发展得比较好，同时要把印度的文明、拉美的文明，也作为我们参

照。因为从印度方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新的东西。它的这个中产阶级有一亿人，它能够运用英文的有好几百万，它是一个五十年来能够发展民主的一个社会，同时它有很多的精神资源可以进行开发。所以这些价值如果互相研究，那可以把这个现代中国文化的资源，能够更丰富价值的领域更宽广，我们不要说二十一世纪是谁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所有人类的世纪，我们要为这个价值创造新的条件，谢谢！（掌声）

主持人：好，还有最后剩余的一点点时间，杜教授再回答一个问题，请大家简短一点。

观众：杜教授，你好。杜教授刚才提到了东亚，我这个问题跟东亚有关，就是杜先生好像写过儒家伦理与东亚企业精神方面的文章，好像是，请您谈谈东亚经济的发展与儒家思想究竟有什么关系，今年来日本、韩国还有其他的一些东南亚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在危机发生之后杜先生对儒家思想与东亚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否有了新的思考？谢谢！

杜维明：这是以前犯的错误，现在改正了。我倒并不是这样，因为在八十年代我讲得非常清楚，假如你要了解东亚社会，你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经济现象，当作一个政治现象，当作一个社会制度现象，不够。你还要了解它的文化。所以文化的提出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主义，或者文化命定论。我是文化的讨论，是一个，我叫它“添加的价值”。是在经济、政治、社会各种基础上面来讨论文化问题。当时为什么会提出儒家，这是西方的学者象彼得·伯格很多其他的学者提出叫“儒家命题”，就是东亚社会。它所谓东亚，包括社会主义和工业东亚，工业东亚是日本，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社会主义东亚包括中国大陆，越南和这个北朝鲜。这些地区的发展有一个可以互通的模式。为什么把它提出儒家论说？其实和新儒学在五四时代经过熊十力、梁漱溟两位先生的努力，三十年，一九一九到一九四九；然后再经过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他们的努力，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然后我们再根据它的基础再进行考察，成为了一种比较崭新的论域，所以才有一定的说服力。可是金融风暴以后我们现在发现这个儒家文化的内在机制更复杂、更重要。譬如说韩国，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韩国的金融风暴，是它的大财阀，象大宇啊、现代啊，和它的政治之间的复杂的人际关系所造成的。那么有没有儒家因素？当然有儒家的因素。但是韩国要自救，它全国有一个全国上下共赴国难的那种精神，连它的家庭主妇都一起参加，这种精神又和韩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很多消极的因素，经济不能发展、社会变得不稳定、贫富不均的问题出现，有很多是儒家因素。但是它能够发展，也和儒家有关系，怎么样去理解它？怎么样去仔细地分梳？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课题。要按照特殊的例证来考虑，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进一步考虑的问题，谢谢！（掌声）

主持人：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对杜教授表示感谢！（掌声）

观众朋友，杜维明教授的精彩讲学让我们真正领略到了当今大儒的风采。我始终相信对和平和美好未来的向往，对于人类如何实现自己的终极理想，这是我们每一个都在时时刻刻思考的问题。新世纪玫瑰色的曙光已经在地平线上隐隐地出现了。我们祝愿，我们也相信，下一个世纪将会是一个充满了欢乐和笑声的祥和世纪！（掌声）

欢迎相聚《新青年》！欢迎相聚《千年论坛》！好，感谢杜维明教授，感谢岳麓书院的老师们，也感谢现场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我们下次论坛再见！（掌声）

责任编辑：王立龄

文章、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http://www.chinakongzi.org/rw/xszj/duweiming/200706/t20070609\\_8081.htm](http://www.chinakongzi.org/rw/xszj/duweiming/200706/t20070609_8081.htm)